

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四)

·曹志源(少年行作者·美國浸信大學教授)

家叔隨節蒞渝， 燃起求生勇氣。

有一天，記得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底，在民衆教育館所訂的武漢日報上(那時該報已遷萬縣出刊)，讀到「蔣總裁蒞渝與軍政首長商議確保西南」的頭條新聞。隨行人員中家叔聖芬先生的名字照例見報，而且他還應記者之間說明蔣公來渝的目的，是以國民黨總裁身份來協助負責同志鞏固西南，並等待李代總統來渝共商國事。蓋李氏那時自知大局不可收拾，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偷偷地逃到香港，以治病爲名，圖潛赴美國，夢想與美國朝野建立特殊關係，也可能是想躲在美國，靜候中共吞沒大陸後，作靠攏求榮的打算。若干年後，李氏的一切夢想不但落了空，而且終於自投羅網，溜回大陸，以爲中共會忘記他過去的罪孽，僥倖圖存，結果被江青一夥人下毒藥把他和他姓郭的妻子一起毒死，也真是投機者的悲慘結局。這一驚人消息，直到毛澤東死後，中共審訊「四人幫」時才公佈出來。不禁使我爲李氏

的晚節不全，未得善終而哀嘆。事實上，值得哀嘆的人，又何止是李氏夫婦？

家叔隨節蒞渝的消息曾使我心情十分激動，好像是絕望中見到一線希望一樣。忠縣距重慶不過數百里，然咫尺天涯，竟不得一見。好友魯國強知道我有個叔父服務中樞，很不瞭解我爲何不設法求救，脫離此「坐以待斃」的苦海。有人稱尸位素餐的公務員爲「坐以待斃」，我們當時也算是公務員，除有飯吃外，無任何薪資，無「幣」可待，真是在「待斃」。因爲共黨來了，不被「斃」，也會被勞改、洗腦、監禁磨「斃」呢！

魯國強曾不止一次誠心地告訴我：「老曹，假若我是你的話，我一定會去找我的叔父幫忙，去走一條比較光明的道路，我相信任何一個人都會這樣作，甚至遠親朋友可能爲力者，我也會去找，何況是近親的叔父，而且他似乎也有救你的能力。……曹聖芬先生真是你的叔父嗎？甯吹牛了，看到姓曹的便亂扯關係，是嗎？……」我家因受儒家思想影響，父子兄弟叔姪之間的關係素極親密，但家教並不鼓勵彼此依賴，尤忌利用親

屬的特殊地位去謀己利，有失公平。家叔當時權勢並非顯赫，但地位特殊，爲最高領袖身邊親信的青年才俊。那時才三十多歲，追隨蔣公身邊侍從機要秘書有年，與美國總統的新聞秘書頗爲相似，名滿天下，交遊廣闊，硬是要找他幫個忙脫離苦海的話，自然可以辦到。雖然他從來不曾主動開口要救我，但我們經常都有書信往來，表示關切，亦談國事。由於魯寶有些懷疑我有攀附之嫌，於是我才從內務箱中取出幾封家叔的來信給他看，他才相信而且十分激動。於是以諸葛孔明的姿態向我分析大局，和各人的處境，嚴厲地要我立即採取行動打破這個「坐以待斃」、不生不死的沉悶局面。

於是，我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家叔，寄到重慶的林園官邸，報告我們的處境和川東局勢的嚴重，並表示希望打破沉悶局面。報紙上繼續報導大局惡化的消息，最令人驚惶的事是蔣公坐鎮陪都時，重慶居然發生大火，據說接近朝天門的那條銀行街被燒成一片瓦礫。報上還有家叔在記者會中呼籲團結，提高警覺的新聞。就在這兵荒馬亂，軍書傍午的匆忙時期，不到幾天，我居然接到家

叔的回信，囑善自珍攝，沉着應變。「如有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時，可去南川依汝長兄，萬不得已時，也可持函去見孫總司令德操（震），請示去處……」，並附一函致綏靖公署主任孫總司令，並沒有要我去重慶，或提出其他具體指示，可見那時他們也是行踪不定，忙碌不堪。

我接到這信自然極端興奮，連忙拿去與魯寶商談。魯寶問我長兄是幹什麼的，我說他是軍校畢業，現在宋希濂的十四兵團當教導總隊長，訓練幹部，相當於一個旅長，目前正轉戰川湘鄂邊區。他說，南川離此數百里，與重慶距離差不多，與其去情況不明的南川前線，何如去重慶作根本之圖。何況你大哥的處境也很危殆，恐怕自身難保，於是魯寶促我去見孫將軍請示。想不到搭輪去萬縣，孫氏的參謀人員告我，孫氏奉召赴渝，下週始歸。我下週再去見到孫氏時，家叔又已隨節他往了。不過孫氏表示局勢在二三年內不致有何劇變，且綏署正準備「把你們編入正規軍……」，隨行並告在渝見到家叔，謂我個人如有問題或計畫，不妨隨時提出，並交代一位參謀人員把我的姓名地址留下，囑隨時聯繫。此行除得到一個消息「綏署正考慮把你們編入正規軍」外，對個人脫離苦海的事並無進展，因我事先既不願向家叔表示有意離開崗位（雖然事實上並無崗位），事後更不願向孫氏提出，蓋恐有違軍人本色也。何況我也知道家叔和孫氏他們也都是公務倥傯，各忙各的，沒有閒暇為我的事作特別安排。回到忠縣，無所事事，一拖又是二個月，「編入正規軍」的事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正如我

前文早已提到，各野戰部隊都是要「兵」不要「官」，加上我們這些半吊子，既非軍校畢業，又非各兵團教導總隊或軍官訓練班畢業，在門戶觀念仍舊很深的當時，是沒有部隊歡迎我們的。也許綏署的計畫落實不了，便是這個原因。

亂世友情深似海，

衷心藏之永難忘。

到了十一月中旬（一九四九年），川東情勢惡化，防守川鄂邊區的羅廣文部隊，及防守湘鄂邊區的宋希濂部隊都被襲擊，潰不成軍。這些福將，平日看起來威儀萬千，一表人材，想不到臨陣不堪一擊，使統帥部保衛西南的整個作戰計劃都為之失效，而不得不將保衛西北多年的胡宗南將軍部隊抽調南下，加強成渝盆地的防務。蔣公坐鎮重慶至最後一天，據說就是在等待胡軍，希望以川西為據點，遏阻共軍撲向雲貴高原，使國軍得機喘息，負隅再戰，徐圖匡復。無如蜀道之難，有如前述，再以交通工具缺乏，部隊連行，多靠雙腳和有限的騾馬汽車。當胡軍抵達重慶外圍時，已疲憊不堪，而共軍挾戰勝的餘威，乃得勢如破竹，輕取西南要地。蔣公以在野之身，負起收拾李宗仁丟下的殘局，於重慶失陷之日才轉赴成都，驚險百倍。（關於這段史實，家叔有「從溪口到成都」一文行世。）

從十一月中到十一月底，這一急轉直下的局勢，筆者身歷其境，目及「兵敗如山倒」的悲劇，感慨特深。而個人以一高中二年級的散兵游勇

能僥倖逃脫厄運，來臺復學，得有爾後之發展，尤屬奇蹟，不得不為之記，以誌不忘，亦足以反映當時時局之一斑。

緣自八月家叔隨節蒞渝，魯寶促我求救不果後，我原已放棄離川赴臺幻想，而與各同志計畫自謀生路，即如果編入正規軍的綏署計畫不能落實，我們將向綏署請願每人發給武器槍枝，與沿江各縣民訓單位的昔日同學聯絡，組織游擊隊，朝川西和雲貴高原方向戰鬪，如該等地區不保，則向滇緬邊區打出路。我們甚至已開會討論多次，在地圖上劃好路線，萬事皆備，只欠東風（武器）了。這時因計畫已定，心情反而鎮定，大家都快快活活地等待槍枝，採取行動。但日復一日，不但槍枝沒有消息，連吃飯的補給都不能按時獲得了。前時時發生這種情形，還可向縣政府商借週轉，現在縣府也決定疏散他遷，共軍已佔據了南岸的石碓縣，萬縣都受到威脅，綏署總司令部也在遷移了。

就在這時，讀舊報知道蔣公於十一月中再度來渝坐鎮，魯國強（魯寶）以極為冷靜無私的態度警告我說：「老曹！現在事已至此，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了！我們既無人管，又手無寸鐵自衛，恐怕只有坐以待擒的一條路。任何人如能自謀生路而不為，那是愚笨。我們同生死，共患難這麼多年，自然希望同在一處，彼此照顧。但現在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你如能去重慶找到你叔父隨去臺灣，那是一條光明大道，將來有朝一日，政府重光大陸，我若沒有被殺，還可有一個朋友來救我，照顧我，我們何必要大家在一起坐以待斃

呢？打游擊的計畫，恐怕也實現不了啊！趕快動身去重慶吧！……」我非常感動，也想趕快動身。但因一年來既無正薪，又無津貼，平日綏署所發的一點象徵性的零用錢，早已花光，如何動身呢？靠討米是到不了重慶的。但我知大家都沒有錢，也從未向魯君提及。一天下午，記得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借魯國強為隊員生活問題去縣府商借柴米油鹽的事，見到平日負責與我們聯繫的蒲主任秘書，他告訴我們問題嚴重，忠縣與川東各縣的電話都已不通了，縣府已奉令疏散他遷，縣長都已棄職逃回成都家鄉去了。蒲氏奉命暫代縣長，局勢再惡化時，也準備隨時動身沿江西遷。我們聽得心慌極了。借糧之事，倒是圓滿完成，因縣府存有餘糧萬噸，正無人管理，「請你們自己去倉庫搬運好了，要多少，便搬多少。我現在簽發你們一張手令，暫寫白米一千斤如何……」臨行時蒲秘書也誠懇地警告我們，如有路子可走，走為上策。這句話激起了魯寶對我的關切，他告訴蒲秘書我們隊上的十六個人，除了曹隊長有個叔父在重慶外，其他人都是家在湖南、湖北一帶，那邊也很亂，回去恐怕也是死路一條，祇有坐以待變了。

蒲秘書連忙問：「曹隊長你叔父在重慶做什麼事？……」我還沒有回答，魯寶說：「是蔣總裁的侍從機要秘書！」蒲氏不待魯寶把名字說出來，便接着說：「是曹秘書曹聖芬嗎？」我說「是！」蒲氏說：「我的小弟！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有這種關係，居然還困守危城坐以待斃，到這種地步，也不想辦法求生……」

蒲氏年約五十許，四川南充人，久歷戎行，見識廣泛，頗善交際，我等到忠縣後，縣長指定他負責與我們聯繫，為人和善，有求必應，成為忘年之交。他並告訴我近日還會有汽船自萬縣撤退軍眷西行，可注意趕搭，同時也告我蔣公還在重慶，李代總統已出國，他判斷蔣公會坐鎮到最後關頭，十天半月不會離開。「你如能搭上一條輪船，一天便可到重慶，見到你叔父，他不會見死不救的！他會有辦法救你的，我保險……」但他們不知道我是「啞巴吃黃連」，身無分文，有苦難言。就在我聽完蒲秘書的話，要握手告別時，我說：「搭輪船不知船票要多少錢？……」這一提，使敏感的魯寶馬上知道我的問題所在了。未待蒲秘書解答我的問題，連忙說：「我多年積蓄，曾在貴陽買了一個小金戒指，可以折半給你兌換，或可得二三元銀洋，想必够用了！……」蒲氏搶着說：「三元可能不够，起碼得有五六個銀洋才够，何況現在銀樓已關閉，市面已疏散，你那戒指恐怕要到鄆都或重慶才可兌換。老弟，幾個月來，我們也算成了共患難的朋友，我還有一些銀洋在身邊，我是四川人，去南充老家的路費也不需太多，你若不嫌棄我這老朋友的好意，我借你三元，到鄆都的路費够了，再兌換他那戒指，不是解決了問題嗎？」蒲氏跑回他的辦公室，也是臥室，帶着三隻銀洋，塞進我的口袋，推着我走，並囑意注意過往輪船。再三叮嚀：「老弟！機會不多了！」

這種亂世友情，是純真無私的，我委實想不到任何語言來描寫心中的感動。「衷心藏之，何日忘之！」就這樣，我決心一試。次日，早餐時，聽到輪船的汽笛聲，好像在向我呼喚，魯寶隨即催我行動。我放下飯碗，提着簡單的行李，由勤務小楊和魯寶陪同，拔腿便跑。忠縣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山城或坡城，我們駐地在高坡上，俯瞰長江，風景不凡，白居易被貶為忠州刺史時，就住在離我們不遠的「樂天亭」現址，寫過許多流傳千古的史詩。當我們狂奔下山，抵達江邊碼頭時，但見滿船武裝部隊，是向東開赴前線的。另有軍眷難民上千，老弱婦孺，神色倉皇，麕集岸上，都是在等候西行船隻撤退的。據軍眷領頭的人稱：「這條船去萬縣把軍隊卸下後，下午便會回來接我們……」我問：「你們為什麼這樣早便在這裏等候呢？」「船是沒有定時的，上船也不對票，誰搶上船，誰便先走！……」這對我已不是新聞，因為抗戰末期，當日本侵略軍每到一地，難民軍眷逃亡的情形，也是這樣。我不但曾看到過輪船、汽車、火車的頂上、階梯上都爬滿了難民，而且看到過婦孺被踐踏、從車上跌下，或墜入水中的悲劇。我得到這個消息後，心中有數，我是一個青年光桿，搶上船的機會自然較多。但願所有的人，都能獲得機會，尤念多年戰友，一旦離別，不知命運如何。心中一則以喜，一則是十分難過的。

我們敗興而還，一心一意注意下午西行的船隻。正是吃晚飯的時刻，果然又聽到汽笛聲。再去江邊，見到早上的那條船，滿載從萬縣撤來的軍眷，拋錨江心，許多人要在忠縣下船，可能是還鄉的。成百的小木船，蜂擁船邊，有的是接人

下船，有的是送人上船，亂哄哄的。槳聲、馬達聲、號哭聲，響成一片，使我想起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家鄉益陽時的情況。我便是在這股亂流中，隨着人潮擠上了船，不到幾分鐘，輪船的馬達加足力量，汽笛狂鳴，鼓浪西行。從船邊遙望岸上，見魯寶和曾替我和隊上同志忠勤服務達四個月的小楊，還在注視着輪船奔逝。但他們一定沒有看到我熱淚潸潸，在江風拂面中，心如刀割。親愛的魯寶，謝謝你的鼓勵和資助，使我走上了再生的光明大道，你後來是否度過了危難？充軍了？還鄉了？上學了？現在是否還在人間？三十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懷念和祝福你們啊！

此去無人知險吉， 煙波江上使人愁。

我們的船於天黑時刻到達鄰縣鄆都而止。因為該船當晚還要從鄆都運兵去萬縣增防。我有廿五位青中同學在鄆都組訓民衆，他們的遭遇與我相同。我找到他們的駐地，一見如故。因為在青中時我曾是全校學生會的主席，後來又同去復興關，大家都認識友好。他們也正爲大局發愁，徬徨不知所措，見我來到，激起一片歡欣，以爲我可以替他們帶來主意和領導。我把我們在忠縣原議的游擊計劃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趁早獲得自衛武器，否則一切皆空，他們深以爲然。我又告訴他們我個人赴渝計劃，但謂如不能如願，當參加他們集體行動。

「最難風雨故人來！」他們買了許多隻雞，

自殺自烹，替我洗塵。我一面吃着，一面想起從軍前當年日寇侵逼家鄉的時候，家中老弱婦孺都去山村避難去了，祇留下我和幾個年輕兄叔和傭人留守老家，那時家中養了許多雞，我們惟恐日本人來了會吃掉我們的雞（事實上何止是吃雞，一切都完了），便天天殺雞吃。太平盛世，只有逢年過節，戚友來家，才以鷄黍招待，鷄的滋味便也特別鮮美。但天天吃的結果，到後來竟感索然寡味，如同嚼蠟。剛至多年後聞到鷄味，心中便欲嘔吐！現在同志們於患難中以鷄待我，雖未嘔吐，但「生不逢辰」、「命途多舛」之感，油然而生，與前次正同。祇是前次的厄運是由外患造成，這次爲內亂的後果。對於我們這些正在成長，需要教育的青年來說，是多麼殘酷啊！

一面吃着，一面回憶，不知不覺已是午夜時光。隊長王衛民兄告訴我，他自然也希望我留下與他們共患難，但正如魯國強兄的無私友愛，認爲我如能去重慶轉赴臺灣復國基地，自爲上策，「坐以待斃，同歸於盡，非兵家深謀遠慮之道也！」他並告我，鄆都去重慶原有定期民航，每週三次。但從川東局勢惡化以來，輪船忙於軍運，民航業已停止。不過運兵船回航時，多載軍眷西行，「兄或有機會擠上！」這自然與我在忠縣時的情景相似，只有等待觀望，聽天由命了。

度日如年地一天換過一天，川東局勢並沒有因部隊的增援而穩定。相反，失敗的消息頻頻傳來。在我到鄆都後的第二個晚上，大家都已入睡，忽然一陣緊急的敲門聲，大家驚惶萬分，以爲發生了情況，莫不是共軍進城了不成。大家都

起床想從後門逃走時，發現原來是從南岸撤退過來的青中同學數人，告以石柱縣已完全淪陷，許多同鄉都已被俘，隊長歐陽天抗抗拒受傷。共軍正疾速西進，我軍簡直已無鬥志，大部份是被共方「局部和談」詭計先瓦解了軍心，然後解除武裝的。據他們親自經歷所知，共軍在還沒有發動攻勢前，不是利用國軍的俘虜打前站、喊話，央求國軍停止射擊，不要殺害自己同胞，或潛入司令部要求「免戰」；便是由共軍指戰員利用通訊網（電話）向我方部隊長提出就地停戰條件，進行「局部和談」，以各種甜言蜜語英雄頭銜，誘惑我部隊長下令停止射擊，終於上當，俯首就擒。

由於統帥蔣公下野後，李宗仁幻想和談所造成的曖昧和綏靖空氣，使政府剿共立場變得模糊。上行下效，上面求和，且不得要領，現在我們下面倒是由共方先提出和談，不是正符合上面的政策嗎？許多頭腦簡單，或存心投降的部隊長便這樣一個一個地俯首就擒，還以爲是符合政府免戰求和的政策，替國家作了貢獻。至於以後的遭遇，在中共統治之下，是不難想像的。段克文曾寫過一本「戰犯自述」說得很多，似乎是可信的。至於多年後李宗仁夫婦被中共毒斃，更是經過中共官方承認的。

南岸撤退同學的親身報導使我們這二十幾個有如「喪家之犬」，「坐以待斃」的青年人更加茫然沮喪，面對如此局勢，竟一籌莫展。魯寶的臨別贈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時在耳邊響起，然而日復一日，不見輪船的影子，

也不聞汽笛呼聲，真是釜江興嘆，招來滿腔惆悵。就在十一月廿四日，我吃完早飯後，從住處的樓上看到一艘龐大的江輪，滿載軍眷和難民，冒着濃煙，自東而來。我心想：莫非皇天不負苦心人，最後逃生的機會來了。提着一箱一袋，由王衛民兄陪着，直奔碼頭。江邊亂況，較忠縣有過之而無不及。上千的軍眷和難民在等待撤退，一見船到，便不由分說地擠上待發的駁船，或自僱小划子向停在江心的輪船闖去。由於秩序太亂，船上本來有許多人要在鄂都下船的也無法下來，站在船頂押船的槍兵們看到情況失去控制，便發射輕機槍鎮壓，並吆喝上船的人且慢。機槍子彈打得水花四濺，自然發生了鎮壓的作用，許多像蜜蜂一樣原已接近輪船的划子聽到槍聲都開始散開。這時，輪船汽笛狂鳴，馬達怒吼，竟不待船上的人下來，便鼓浪西進，逃之夭夭了。王隊長衛民兄安慰着我，幫我提着那不值錢的簡單行李，回到宿舍。然後以電話約請當地幾個朋友，也是平日與他組訓民衆業務有關的地方長官和我，一道到他常去的一個尚未開門疏散的餐館吃午飯。王兄顯然感到我去重慶的機會已不太多，有意介紹我與他相好的幾條地頭蛇認識，交換情報，並繼續他們早已開始討論的應變計畫。沒想到兵荒馬亂的時候，我還有機會吃到這麼一頓生命中難忘的美味午餐，不但菜好酒香，參加的客人也是個個健談，而且口才常識都不錯。

關於四川人的口才一點，我要在這裏帶上一筆，就是我自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到重慶以來，便發現所有我見到的四川人似乎都是能言善說

，雖販夫走卒亦然。我後來發現這似乎與四川的一種社會風俗有關，那便是泡茶館和擺龍門陣，二者是連帶的。四川茶館之多，喝茶風氣之盛，到過四川的人都難以忘記。公餘週末，黃昏飯後，男士們都邀約幾個朋友去茶樓一坐，一碟瓜子，一杯清茶，便開始擺起龍門陣，一擺便是幾個小時。尤其是夏日炎熱的氣候，戶內有如蒸籠，人們多在露天茶館坐到深更半夜還不同家。茶樓裏也不重視公共規律，瓜子花生殼直接拋到地上，夜可盈寸。言談笑唱之聲嘈雜不堪，誰也不干涉誰，誰也管不了誰，談話內容與談話的聲調一樣複雜，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夫妻吵架，無話不談。可說一點情調也沒有，也可說那便是情調。事實上我不但習慣那種情調，而且常常懷念那種情調，多麼自然，多麼開懷。我到現在談話的聲調還是很高，就是在四川這幾個月培養出來的。我想，四川人何以人人能言善說，也是從龍門陣裏擺出來的吧！

那天吃飯的人連我和王隊長一共六人。那道地川味的豆瓣魚、麻辣子雞、魚香肉絲、豆花等等，鮮美到三十年後的今天回味起來，仍不免要嘔口水。但那火辣的程度，連我這來自辣鄉湖南的人也為之涕淚交流，看起來好像是在為大局哭泣一般。吃喝間，祇聽到王君與他們稱兄道弟，許多措詞，都不是日用語言，起初忙於杯箸，我也無意瞭解他們所談。後來傾耳細聽，始知他們在以「袍哥」術語交談。

「袍哥」是我國民間幫會組織的一種，在四川甚為普遍。參加的人要拜把宣誓，歃血為盟，

大家以道義氣節相勉，生死以之。同仁按年資有長幼大小之分，層層節制，紀律嚴明。這種民間組織，在西方社會也很盛行。如前面提到的美國「後臺老闆」(Boss)或「滅非」制(Mafia)等等，也是以某人或某團體為中心，結成盟會，在社會上爭取領導或控制權，凡與之不善者，必去之而後快。其組織龐大，經費充裕者，則至控制選舉，左右政府政策，如有名的紐約譚曼尼社(Tammany Hall)、前芝加哥市長兌里等等。正如任何一種組織，「袍哥」也會牽涉到「權」「利」問題。而且正如英國政治哲學家艾克敦(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絕對使人腐化！」「袍哥」們在地方上建立了羣衆基礎，獲得控制權後，不要說在社會上會橫行霸道，唯吾獨尊，目空一切，連國家主權，政府威信都不免受他們的擺佈。如美國的譚曼尼社和兌里市長，中國上海的杜月笙、王曉籟一樣。據說四川社會上的小杜月笙幾乎充塞各階層，我在忠縣便已聽到。前面提到的蒲主任秘書據說便是袍哥中的頭頭。他立即給我三隻銀洋作路費的明快作風，也是標準仗義輕財的袍哥作風。

由於王隊長衛民兄與他們以袍哥術語交談，我暗中揣測，王君這幾個月來，很可能已加入了他們的組織。王君雖然與我同是從青年軍退役後入貴陽青中，然後赴復興關受訓，再被分發到鄂都來組訓民衆，但年紀起碼較我大了四、五歲。對社會情況，尤其是當前危機的認識，自然較我們為深。他們的談話，據我一知半解，似乎與局

勢的可能發展和應變計畫有關。從他們飲酒談笑的表情上，我看他們很可能沒有認識到局勢的嚴重和共黨的可怕。他們也許以為這次變化，與歷史上改朝換代一般，換一個皇帝便沒有事了。他們照常可以控制着社會的基層，我行我素，新政府也必然要爭取他們的合作。這種想法，在當時社會各階層似乎都很普遍，是一種「想當然耳」和「僥倖」心態的混合物。殊不知共產革命是狂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它要徹底把舊社會的一切剷除，建立一種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還會容許這種封建社會的幫會組織存在嗎？王兄在個人和團體的前途茫茫時，想獲得當地袍哥們的保護應變，用心是良苦的，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其結果如何，便難揣測了。

就在大家吃喝得起勁，話題轉到難民軍眷的撤退和我去重慶的可能時，一位醉醺醺的食伴却提供了我一個逃生的新消息，也是決定性的消息。他說：「剛才我沿江邊大路來餐館途中，在距此地約袍把里（十里之謂）的地方，看到一艘大輪船停在江中卸難民……船頭向西，不知是不是去重慶的。……」我一聽便知那一定就是上午我去趕搭未成的船，它大概是爲了躲避鄂都碼頭太多的人羣而改停在郊外卸人的。餐會既近尾聲，我便向王君請求早退，前往一觀究竟。於是疾返住處，拎着包袱，拔腿便跑，沿江路西奔。恐怕至少跑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達輪船所在的江岸。筋疲力竭，上氣不接下氣的我，又想起了從軍前在家鄉風聞日軍在家鄉千家洲登陸時我狂奔逃命的一幕，跑了十餘里之後，兩腿不支而摔倒的絕

望之痛。這次雖沒有日軍追趕，但其爲逃命則一。

先我而到的難民羣又把江岸擠得水洩不通，而且船上的人下來後，過去幾小時內上船的人又把船艙、船頂，甚至樓梯上都爬滿了，還有成百的人急向押船的官兵求恩圖爬上船去，我在岸邊竟找不到划子或駁船載我上船，望着升火待發的輪船欲哭無淚。這時已近黃昏，夕陽照耀着滾滾江流，兩岸景色如畫，天邊散佈着彩霞，好像是紫水晶、紅瑪瑙和翠玉一般，滿天都是，使我想起在忠縣樂天祠中讀到的一首白居易（樂天）的詩：「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誰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這首詩可能是白先生被貶忠州時看到江色而寫的，前面兩句把我當時所看到的景色活生生地描畫出來，但我當時的心思煩亂，也沒有閒情來欣賞那詩情畫意了。

船已暴滿，靠近輪船的許多滿載難民軍眷的划子，還在如蒼蠅叮臭肉似的不離去，又惹起槍兵的鳴槍吆喝，才紛紛靠岸，使輪船安全移動，揚長而去。我在江岸人羣中，顯示出無限沮喪失望之情，忽然一個船伕走過來搭訕說：「長官！你要不要去涪陵？我可以送你去！……」一詢究竟，才知道船伕是從涪陵被軍方拉差來的。現在沿江軍運倥傯，若以空船回去，中途必被再拉當差無疑。他躲在這個城郊樹叢小肆業已兩天。願載我去涪陵，因我着軍裝，有軍人身份，沿途軍人，當不致再強迫東下了。他說船費可免，但請供應船伕二人沿途伙食便可。

寒天冷月孤舟客， 不聽猿聲亦斷腸。

就在船伕與我交涉的時候，一個年輕軍官聞聲而至，他也是想搭船西行去涪陵附近還鄉的。有了旅伴，膽量也大了起來。坦白地說，原來我還有些擔心那船伕對我不懷好意，因爲江上謀財害命的事也常發生，我形單影隻，身懷銀洋三隻，金指環半個（蒲秘書和魯寶所贈，還沒有動用），手無寸鐵，一人上船，說不定船到無人之境，他們將我殺了，投屍江心，真是神不知、鬼不問。我這當年雄心勃勃的少年志士，不死於抗日，不死於剿匪，却成了長江的魚食，那才不值得呢！我當時面對着那兩個粗壯的船伕，看到夕陽西下後的長江，像烏龍一樣的婉曲奔騰，咆哮東去。想著不到幾天，它便可看到烽火連天的襄（陽）樊（城）和正被戰火燒灼的江南京滬，引起我唏噓浩嘆不止。又想到從軍離鄉以前，住在邀我一道從軍，後來中途開了小差的陳光祖君家中，他以拂逆家人阻其從軍好意，他盛怒中的姊姊脫口而出咒罵道：「你們都是不聽忠言的小子，將來會死於非命，死無葬身之地的……」不禁打了一個寒慄。但看到那比我年紀大的年輕軍官也要搭船，這種無名的恐懼感便完全消失了。

我們隨即登船出發，二人各出銀元一枚給船伕在岸上小店買些柴米油鹽，以供路上共食。船是一艘普通划子，長二、三丈，寬五、六呎，是涪陵所在的烏江小船，並非航行長江用的。除了

尾部舵手處有竹框和棕葉編成的臥篷稱爲「鵝窩」外，別無遮蓋。船伏二人，一前一後，溯江而上，蝸步前進。多半時間是在南岸迴流中航行的。一路上頗有「江邨暝色漸淒迷，數點寒鴉雜雁飛」的景象。第一天走了約三十里，停在江邊一座古木參天的古廟下，月黑風寒，廟裏的孤燈半明半暗，我很想捕捉一些「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詩情畫意而不可得。

四個人擠在狹小的「鵝窩」裏過夜，倒不覺冷，但拂曉前下起雨來，却把被褥浸濕不能續眠，實在是十分痛苦的事。「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似乎可以描寫當時的情景。兩個船伏雖然是三十餘歲的壯年人，但都染有芙蓉癖，就在我不能續眠而睜視着江潮泛濫，心中充滿了生不逢辰的感慨時，其中一人向我們提出要錢上岸抽「白麵」（大烟）的要求，二人嬉皮笑臉地鼓動如簧之舌，謂如蒙賞賜得赴岸上烟館一飽，則日間必精神百倍，也可快點到涪陵。這時使我回想起在貴州服役青年軍時聽到，以及在忠縣鄉間組訓民衆時親眼看到，抽大烟或鴉片烟的惡習，在西南各省還是非常猖獗，鴉片戰爭過去業已一百多年，當時林則徐痛陳烟害的警語猶在耳邊，國民黨執政以來提倡新生活運動的努力和苦心，以及後來三令五申的禁烟法律，居然還沒有把這戕害民族健康的惡習禁絕，可見民智不開和政令難行的事實。我在忠縣鄉間，有一次恰逢某紳糧收媳婦，被邀作客，居然看到到處都有人拿着烟槍大搖大擺地抽吸，而主人更特闢房間數

處，招待貴賓躺在床上吞雲吐霧，甚至還恭請我「督座」也來吹扒一番。當我謝絕後，陪同我的鄉長見告，鄉間有產階級仍多醉生夢死之徒，不要說吹大烟是表示身份和社會地位的一種標幟，甚至女兒出嫁，先要問男家有幾枝烟槍。烟槍愈多表示愈有地位，愈有地位，便愈可娶到好的姑娘。我的天呀！難怪我們的國家社會近代化了不了，也難怪外國人叫我們東亞病夫啊！

當船伏們提出這不情之請以後，我們實在也沒有辦法，既不能依法究辦，也沒有時間從事禁烟宣傳，我們只希望他們把船開動，早點到達目的地。我開了他們一點玩笑說：「你們不知道抽大烟是犯法的嗎？我是政府官員，不怕我槍斃你們嗎？……」你猜他們怎麼回答：「長官！當烟癮發作的時候，就是被槍斃也要抽啊……！」我與那旅伴只好各拿出一些零錢來，讓他們上岸去過癮一番，不到半小時，祇見他們果然笑容滿面，跳跳蹦蹦地回到船上，拿起槳篙，把船撐離岸邊，繼續我們的航程。

那位青年軍官在第三天的下午約離涪陵還有二十里的地方下了船，回到他的故鄉去了。臨別依依，彼此祝福，萍水相逢，共同度過了患難的兩天，也算得是有緣了。這時，岸上的行人漸多，似乎是從涪陵疏散還鄉的。據他們說，涪陵已成了個空城，祇剩下一些駐防的軍隊了。

我們繼續沿江長江南岸西進，還得渡過一條烏江，才可進城（涪陵位於烏江與長江匯合處）。當我們到達烏江時，已是深夜十時，不見燈火，但可隱約看到城邊江航碼頭上還停着一艘大輪船

，坐東朝西，船頂上還燃着一盞昏暗的燈。我心中激動不已，好像這盞燈便是我的救星一般，因爲我想那船必定是赴重慶的。船伏們原想把我放在烏江的東岸下船，明天再渡江進城。我怕失去搭乘那輪船的機會，堅請當晚送我過江，以便探詢究竟。不意船還只是過渡了烏江一半，一陣機關槍便朝我們掃射而來，打得水花四濺。隨後祇聽到對面的哨兵高叫「口令」、「口令」。船伏們被嚇得魂不附體，高呼救命。我叫他們閉嘴，然後跑到船頭答話：「同志們，我是從萬縣綏靖公署派到重慶去公幹的，不知口令，請讓我靠岸供你們檢查！」槍聲停了，打水的槳聲清脆可聞，劃破了黑夜的沉寂，對岸幾支手電筒，不斷向我們照射過來。

登岸見到哨兵和他們的領頭——一位年輕的楊排長，他聽我說明和看過我的證件後，熱情地把我帶到他們的哨棚，拿出一些他們吃剩的豆腐蘿蔔之類要我消夜。楊排長並告我前方軍事失利，他們是屬楊幹才軍，駐防烏江流域，明晨還有最後的一班輪船開重慶，要我就在他們哨棚內由兩張方桌搭成的床鋪上睡覺，明早由他送我上船。我聽到這番話，一則感激不盡，一則感到安心，加上疲倦，竟通宵熟睡，要不是那好心的楊排長把我叫醒，我真會失去搭船的機會啊！醒來喝了一碗豆漿，天還未亮，楊排長便領着我向輪船碼頭走去。一路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口令」之聲不絕，都由楊排長應付妥當。半小時後到達長江南岸的碼頭，發現一條長約半里的長蛇陣，都是按秩序等待上船去重慶的人。這裏有駐軍

(四) 泳游中流逆的史歷在

維持秩序，一點也不亂。楊排長見到長蛇，知如果按照秩序，恐怕我輪不到機會，因為我們到達時，船上的乘客已經很滿了。於是他帶我直赴船邊，由他向守衛船梯的同志報告我的情況，獲准優先登船。

匆匆握別，我欲以銀洋一隻相酬，他說：「同志，你簡直是侮辱我嘛！」我含着感激的眼淚，目送他離船返岸，消失在街衢巷尾中。

鄉人易君左先生過涪陵時曾有詩云：「縉夫涉水輕，萬疊山巒壓，白鷺掠頭飛，青魚穿脛滑。江心大風浪，萬樹銀花發，飄然過涪陵，直下瞿塘峽。」這詩寫於戰後還都的路上，其情感受自與我逃難西溯過涪陵的情景大為不同。

傷心欲問前朝事，

惟見江流去不回。

船上擠滿了人，自然談不到座位，我拎着包袱，在甲板上想找一個角落把包袱放下墊坐都不可得。最後終於在船尾廁所邊找到一個空隙，隨即佔住。這時船已啓錨離岸，拋下了大羣絕望的乘客，是難民還是軍眷，殊難分辨。

船在江心鼓浪西溯，兩岸景色在晨霧中顯得特別清新，遠山挺出高聳的胸脯，和那起伏伏數不清的山脊，輪廓分明。岸上又不時出現「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畫面。景物依然，江山如舊，祇是心情與半年前東下時完全不同了。半年前儘管大局已經惡化，我仍舊抱着希望前往川東。那時大江以南和西南半壁河山仍舊在握，

大可有為。想不到在李宗仁的「領導」下，和談未成，民心盡失，軍無鬪志，社會動搖，才不到一年光景，便成了土崩魚爛的局面。連他自己也失去了信心，而遠走高飛，逃亡到海外去作寓公了。

我坐在船尾，不時凝視着從馬達裏翻滾出來的水花，回想一年來國事的變化，心中充滿了「孤獨異鄉人……那堪正飄泊」的情懷，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淚下。旁座的人，知道我有滿腹辛酸，也有來搭訕的。大家命運相同，徒悲國事之難馴而已。

同行的人中，也不乏惟恐天下不亂甚至歡迎中共的人，一有機會，便從事宣傳，把國民黨的失敗如數家珍，印證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事實，認為大勢已定，無須再存二心。這些說客似乎擁有一些聽眾，因為那時大家都是六神無主，無所適從，一有人談時局前途，便覺得是在迷失了道路方向的大沙漠中見到北斗七星似的。我雖然從理論上有充分的知識與他們展開辯論，如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共產極權將剝奪人民自由等等，但覺得事實上拿不出證據來支持我的理論，如談「民主」「自由」的高調，是沒有人聽得入耳的。

記得在忠縣的一次鄉民大會上便曾遭遇難題。「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吃飯和活命，民主自由既不能吃，國民黨也沒有給我們，要它幹什麼？……」一位鄉民代表這麼說。這自然是膚淺的說法，但也是現實的問題。你不能餓着肚子叫民主自由啊！我被反駁得失去了說服的力量。直到三

十多年以後，國民黨在臺灣的成就，才提供了最好的答案，連中共領袖人物們也不得不承認失敗，而喊出「向臺灣學習」的口號了。可是一九四九年的大陸情形，固然是因八年抗戰和內亂的結果，但其民窮財盡的悲慘景況，比今日大陸也好不了多少。致使人民對政府失望之餘，對中共的「解放」謔言心存幻想，這是必然的。不過那時的經濟失敗，國民黨還可找到有力的藉口和事實來推脫責任，諉過於人，如八年抗戰和中共作亂等等。然而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多年依然故我，甚至每下愈況，則是責無旁貸而且找不出理由諉過於人的。加以國民黨在臺灣治績輝煌，儘管龐大的軍費佔了預算的大部，仍舊能把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到大陸同胞的十倍，不但提供了客觀對比的事實，而且也足以作為推卸他們在大陸戰後失敗的有力理由。兩種理論和制度的優劣，只有在這種以事實為基礎，以時間為證人的情形下才可顯出。這時，一切宣傳，一切說客都是多餘的了。然而，在一九四九年那種情形下，國民黨在現實環境的沙堆上失去了站穩腳跟的基礎，而中共的空中樓閣却掌握了民心贏得了江山。

在船上最為人注意的，是一些幾個月前在華北、華東戰場上被中共俘虜的國軍士兵幹部，在經過中共一番洗腦後，統統被釋放還鄉，成了中共的代言人。他們把所受到的「優遇」，以及在「解放區」看到的「好事」，現身說法，最是迷人。因為當時許多未親近過共產黨的人，對他們都還存有恐懼心理，經過這些放出的俘虜這麼一說，個個都不再存戒心了。這樣，中共的兇焰還

不能勢如破竹嗎？但後來三十年的事實演變，三反五反、下放勞改、文化革命等等，才又反證當時這些頭腦簡單，沒有政治知識和哲學修養的人，包括為中共宣傳的所有同情者、同路人，如被釋戰俘、不滿現實的文人墨客、失意政客和惟恐天下不亂的人，甚至也可包括那些曾是中共領導階級的人，如劉少奇、彭德懷、黃克誠、林彪、四人幫和其千萬黨羽等等，所幻想和宣傳的非是。

這期間，國家和個人所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太大了。等了三、四十年的考驗才揭曉，時間也實在是太長了。正如中共偽副總理陳雲在痛陳中共三十年的失敗時說：「人生有幾個三十年？」中國人民還要再等三十年來分清黑白和是非嗎？幾千年來，中國人民便是這樣糊里糊塗地被統治者所愚弄，一代復一代地忍耐、等待、犧牲，永無生路。還應該再等待容忍下去嗎？

在嘈雜聲中，大概是下午三、四點鐘，不知不覺到了重慶的鄰縣長壽，有許多人要下船，報僮叫賣著重慶出版的日報，隨手買了一份來看，知道蔣公還沒有離渝，心為之定，因為見到家叔的機會大概是沒有問題了。船在長壽卸人後續航，於暮色蒼茫中抵達重慶朝天門碼頭。我形單影隻地進了城，祇見滿街雜亂，人如潮水。但這不是盛世的熱鬧繁榮，而是亂世的緊張慌亂。城裏的人扶老攜幼向城外逃，城外的人也有向城內逃的，加上前方敗退的散兵游勇，到處都是。我原打算先找一個旅館或客棧住，再圖與家叔聯絡，豈知所有旅舍不是關門，便是奉令拒收客人，大

概是怕亂民或匪謀滲入搗蛋吧。我孤獨地混在人流中遊蕩了一個小時，見到那高聳入雲的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別來無恙。作了一番巡禮以後，經過附近一家澡堂，門是開着的，便走過去與老闆接頭借宿，他看我不像壞人，允我在澡堂的躺椅上過夜，並許借用他的電話，與在林園官邸的叔父取得聯繫。

家叔自然是驚喜交集，問道：「你們是不是不戰而退了？……」我只好說：「六叔啊！說也慚愧，我們手無寸鐵，又無單位可屬，欲戰無從呢！……」他富即指示明晨去五四路一位他的朋友處待命。那天好像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五日，下午搭交通車赴官邸晤見家叔。自一九四六年在貴陽聆靈山一晤，才短短三年，國事盛衰滄海桑田，如同隔世。林園官邸是蔣公駐節處，軍政要員出入頻繁，共軍雖已進逼城郊，但看不出有一點緊張亂象。據聞蔣公仍鎮靜如常運籌帷幄，調兵遣將，作與匪背水一戰的打算。無如民心士氣已一蹶不振，川湘鄂守軍受共方心戰攻勢不戰而潰，堅強的胡宗南大軍從遙遠的西北兼程南來，不及整備，共軍已至。終於西南、西北半壁河山，為共方輕取。我承家叔之介，於廿六日隨搭當時監察院于院長右任和司法院居院長正的專機，經廣西南寧，於廿七日抵臺，逃脫了被中共奴役的命運，開始了新的生活。三十年來，個人從一個高中沒有畢業的散兵游勇，受國家的培育，大學和研究院畢業，戶位外交界十餘年，嗣復得美國南方浸信會之資助，完成博士學位，又執教彼邦大學十餘年矣。這種個人的成長和發展，祇有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和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才有可能啊！此期間為國宣勞之功固不足道，而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上，自覺當不後人。人生幾何，得來虛度，夫復何求。至於國家，經此三十餘年的巨變，隔海而治，成敗善惡是非亦已昭然若揭，今後中國人民自處之道，自無須再事躊躇。祇要從善如流，擇善固執，向成功的一面看齊、效法，便可與其他先進國家的人民一樣，共享富強康樂、長治久安的「人」的生活。筆者有幸目覩此一歷史洪流的怒潮澎湃，倖生至今，且能略盡一己微弱力量，盡瘁國事凡二十五年，雖無成就，但可不負此生，實亦萬幸。飲水思源，父母哺育之恩，家叔提攜之德，國家培育之功，不可不再三申謝，以誌不忘。至於來臺後之發展，個人事業與國家世界演變，待述之事繁多，當俟他日課業稍閒時提筆憶述，另出一、二書，以報讀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200元

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200元

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